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与促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建议

黄群慧,郝鑫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2488)

摘要:将实体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层(R_0)——制造业,主体层(R_1)——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整体层(R_2)——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第三产业。根据实体经济的三层分类框架,全面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并进一步从工业化发展阶段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个维度对我国实体经济与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这四个典型工业国家进行比较。总体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过早过快去制造业化”“过早过快去工业化”“脱实向虚”的问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并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推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些问题和趋势基本得到遏制,我国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总体上步入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着力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应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先进性,以战略协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协调性,以量促质保持实体经济体系完整性,以强链补链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安全性。

关键词:实体经济;新型工业化;制造业占比;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25)02-0033-16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502033

实体经济不仅是国家发展的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新时代,其发展指向转变为满足国内需求、推动产业革命、适应全球生产体系重组及应对大国博弈的新挑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将其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1]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2],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强调“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5]。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了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从“健全促进

作者简介: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郝鑫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完善现代化体系研究”(编号:24&ZD044)的成果。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尤其是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6]。从党的十六大的“正确处理”到十八大的“牢牢把握”,再上升到十九大的“必须”和二十大的“坚持”,体现出党中央对实体经济的重视保持了一贯性和长期性,并逐渐对实体经济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一、实体经济的分类框架

国民经济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组成。早在21世纪初,我国就有学者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行界定并对其关系展开研究,认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与虚拟经济的扩张发展密切相关,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又会引致泡沫经济,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7-8]同时,由于货币流动的非对称性和资产收益率差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生经常性背离。^[9-10]还有一些文献从定价方式、功能作用等不同角度在经济理论和统计实证层面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进行划分,认为虚拟经济并非依赖于生产和服务来获取利润,而是“用钱生钱”^[11],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为支撑的价格系统,虚拟经济是以人的心理预期为支撑的资本化的定价系统^[12-13]。虽然论述很多,但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涵义和具体产业范围在广泛的使用过程中仍有不同,易造成混淆。

在此情况下,黄群慧^[14]在梳理总结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具体产业层面,提出了实体经济的三层次分类框架,如图1所示,整体国民经济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组成,实体经济内部从狭义到广义可分为核心层(R_0)、主体层(R_1)和整体层(R_2)。其中,核心层(R_0)为制造业;主体层(R_1)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包括 R_0 、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其他工业;整体层(R_2)包括 R_1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相对应,虚拟经济由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构成。这一实体经济框架可以与三次产业划分相对应,核心层(R_0)为制造业,主体层(R_1)由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构成,整体层(R_2)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第三产业。^①

基于实体经济的三个层次,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能够划分如下四对关系: R_0 的内部结构、 R_0 的外部结构、 R_1 的外部结构和 R_2 的外部结构。^②基于 R_0 层次的实体经济,其内部结构是指制造业内部各行业关系,外部结构是指制造业和农业、建筑业及其他工业行业关系,以工业产业结构关系为主^③;基于 R_1 层次的实体经济,其外部结构是指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基于 R_2 层次的实体经济,其外部结构是指广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R_0 的内外部结构主要体现了制造业和工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构调整问题, R_1 的外部结构主要体现了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结构服务化问题, R_2 的外部结构主要体现了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和对实体经济的挤出问题。

二、21世纪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按照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将21世纪以来划分为新时之前和新时代之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根据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进行划分,^[15]工业化进程一般可以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

① 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划分如下: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② R_1 的内部结构就是 R_0 的外部结构, R_2 的内部结构就是 R_1 的外部结构,不进行重复划分。

③ 农业现代化依赖于工业发展,基于这一视角农业也可划分为工业。

和后工业化五个阶段^①。新时代之前,我国主要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大约在 2011 年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进入新时代后,我国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不同时代背景下实体经济发展的特征各有差异。具体而言,2000 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 26,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后半阶段;2002 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 33,整体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0 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69,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即将步入工业化后期。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水平进入到工业化后期。2015 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84,工业化水平推进到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2020 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93;目前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大体接近 100,人均 GDP 和三次产业产值比例达到后工业化标准,可以认为基本实现工业化,即将或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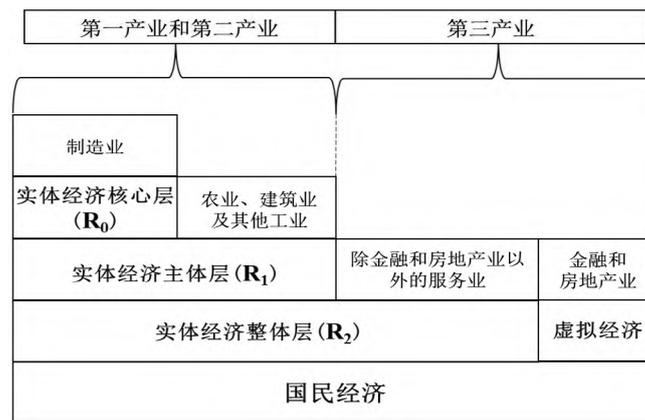


图 1 实体经济分类框架

通过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和快速发展,中国于 21 世纪初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成为一个工业经济大国。21 世纪的前十余年,我国战胜了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各种风险、困难和挑战,并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0—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 10.2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约 3.9% 的年均增速,其中有 6 年实现了 10% 以上的增长速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计算,2011 年中国 GDP 为 7.298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 10.48%,比 1999 年增加 7.12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超越了德国;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6]我国实体经济高速发展,推动我国迅速跨过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我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

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冲击带来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我国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实现历史性跃迁。2013—202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以上,远高于同期世界 2.6% 和发展中经济体 3.7% 的平均增长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居世界第一。2014、2016、2017、2018、2020、2021、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相继跨越 60、70、80、90、100、110、120 万亿元大关,2023 年达 129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020 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2 年进出口总值超 42 万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2 万亿元,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14.7%,连续 14 年居全球首位。^[17-18]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推动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我国实体经济踏上了更高质量、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快车道,呈现出生产稳定增长、结构优化转型、多种经济类型蓬勃发展的特点,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实体经济大国地位得到巩

^① 对应工业化的前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该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分别取值为 0、1~33、34~66、67~100 和大于 100。

固和加强。

基于实体经济分类,实体经济 R_0 、 R_1 和 R_2 三个层次的增长情况如图2所示,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如下趋势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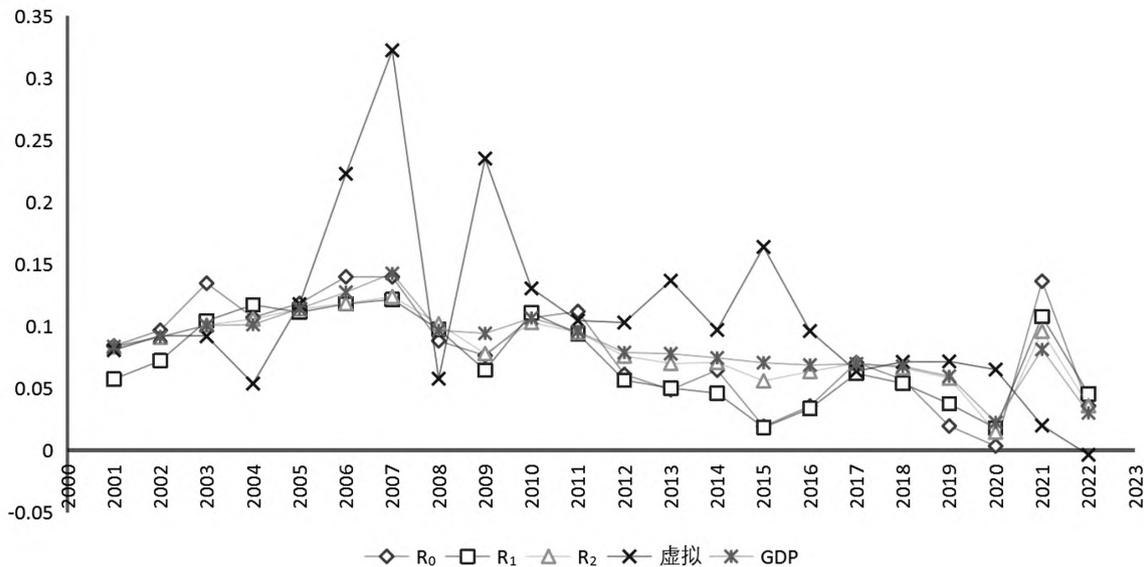


图2 2001—2022年以来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和GDP的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3)。

(一) R_0 层次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了中期快速发展阶段,加入WTO后,在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驱动下,作为实体经济核心层的制造业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参与相对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含量、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实体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业规模快速增加,逐步成为“全球加工厂”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200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为6.0%,居世界第四位;2007年该占比达到13.2%,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上升为19.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自2010年开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

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从中期向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我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于“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鼓励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政策驱动,尤其是在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下,2011—2015年我国实体经济 R_0 增长率出现明显下滑,这反映出我国存在过早过快去工业化和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2015年,我国开始全面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此后的两年我国建立了“1+X”规划体系,进入制造强国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实体经济 R_0 增速显著回升,重新回到了与服务业增速相近的区间,其占比快速下降的趋势也得到了初步遏制。2018年之后,我国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冲击,2021年和2022年制造业增速都高于GDP增速,保持了制造业比重稳定。总体看,新时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显著的高质量趋势,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制造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制造业结构日趋高端化。2013—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6%、9.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8、2.4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制造业增加值年均6.4%的增长速度。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年均增长13.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年均增长13.6%,医药制造业年均增长11.7%,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年均增长10.9%。2021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2.4%和15.1%,比

2012年分别上升4.2和5.7个百分点。^[19]

从制造业占比看,如图3所示,在2012年之前,我国实体经济 R_0 占比在30%~33%之间波动,略有上升趋势,于2006年达到32.45%的峰值,2006年之后出现了“去制造业化”趋势,2011年出现“过过去制造业化”趋势,从2011年的32.06%下降到2020年26.29%,十年间制造业占比快速下降约6个百分点。新冠疫情期间,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完整的产业链和出口能力,制造业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其增速再次攀升至2006年以前曾达到的高于GDP增速的水平。2021年和2022年占比又开始反弹上升,2022年达到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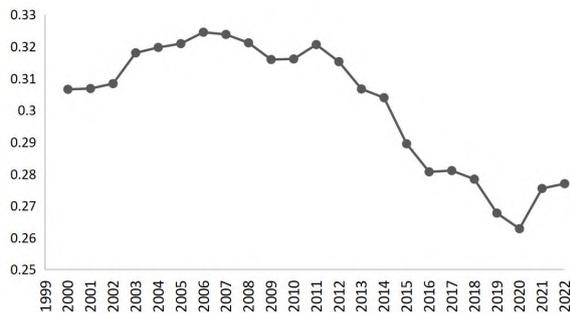


图3 2000—2022年中国实体经济 R_0 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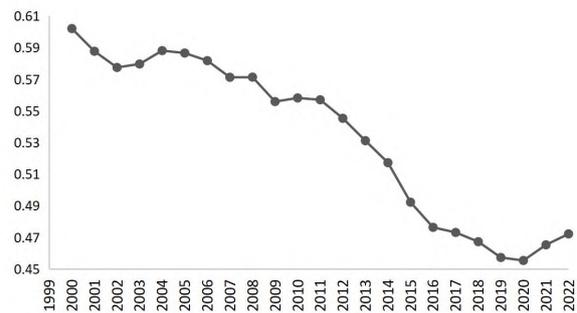


图4 2000—2022年实体经济 R_1 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

(二) R_1 层次

R_1 层次实体经济包括整个工业和农业,总量上以整个工业为主。21世纪初到进入新时代之前这一时期,我国工业领域充分利用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坚持科学发展和快速发展并重,工业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2003—2010年,我国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45%,是拉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工业产品规模扩张迅速,2011年,微型计算机产量比2002年增长20.9倍,移动通信手持机增长8.3倍,集成电路产量增长6.5倍,家用电冰箱产量增长4.4倍,粗钢产量增长2.8倍,纱产量增长2.4倍,汽车产量增长4.7倍,发电量增长1.8倍。^[20]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已踏上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征程,在保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较快增长、复杂产品制造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对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业推动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愈发凸显,2021年工业增加值达到37.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2.6%。2013—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1%,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水平。

从农业发展看,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裕,农业经营方式进一步转变。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实现快速发展。2011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为9.7亿千瓦,比2002年增长了68.7%,年均增长6%,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8亿千瓦,比2012年增加了0.5亿千瓦,2013—2021年年均增长0.6%。2004—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连续八年增产,2007—2011年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超5亿吨,标志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跃上新台阶。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55000万吨大关,达到57121万吨,比2002年增产11415万吨,增长了25%,年均增长率为2.5%。自2015年起,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九年超过1.3万亿斤,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3908亿斤,为历史最高水平,比2012年增加了1763亿斤。^[21-22]

从21世纪以来实体经济 R_1 占GDP的比重变化看,在增速方面,我国实体经济 R_1 的增速与实体经济 R_0 的趋势相同,但略低于实体经济 R_0 的增速,这实质上意味着制造业增速总体上高于工业。在占比方

面,总体上实体经济 R_1 占GDP比重从2000年到2020年呈显著直线下滑趋势(除了2003年和2010年略有反弹外),2010年前下降趋势略微平缓,实体经济 R_1 占比波动下降了4.39%,但随后大幅下降10.28个百分点,在2020年达到最低点45.54%后小幅上升。2021年和2022年开始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占比分别提高了0.99和1.68个百分点,2022年该比例为47.22%。总体而言,21世纪前20年是实体经济 R_1 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是在国民经济占比快速下降的时期,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实际上,2010年之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因此从2010年到2020年,实体经济 R_1 占GDP比例是快速下降的,表明了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就开始了加速“去工业化”过程。但是,在2022年我国总体上实体经济占比仍超过47%,这基本符合服务消费和实体性产品消费是“50%~50%”结构的一般规律,^[23]还不能说我国已经“过度去工业化”。

(三) R_2 层次

对于最为广义的实体经济 R_2 内涵而言,是把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两个行业以外的所有服务业都纳入实体经济。从服务业的总体分析看,2003—2011年,服务业保持了较快发展态势,年均增长11.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41.5%提高到2011年的43.1%,提高了1.6个百分点。^[24]现代物流业、商务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等迅速发展,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持续攀升,2014年达到49.9%,超出第二产业4.3个百分点,成为对GDP贡献率最大的产业;2023年达到60.2%,比2012年提高15.2个百分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8.8万亿元,2013—2023年年均实际增长6.9%,增速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升,2015年首次超过50%,2023年达到54.6%,连续9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25]

在服务业中,作为虚拟经济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5年之前总体处于平稳时期,其中金融业略微下降,而房地产业呈现缓慢上升态势。2005年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开启了快速增长,到2020年金融业占GDP比重比2005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相应地房地产业占比提高了2.7个百分点,总体虚拟经济占GDP比重提高了约6.9个百分点。2015、2016、2020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都超过8%,甚至超过美国2001年互联网泡沫和2007年次贷危机时金融业占比的高点(分别为7.7%和7.6%)。2020年,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构成的虚拟经济占比达到了峰值,约为15.5%。这背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以房地产投资作为重要驱动的投资的快速增长,我国GDP增速对房地产的投资增长具有较大依赖。与虚拟经济发展相对应,从 R_2 层次的实体经济看,2005年之前总体处于平稳发展,2004年达到最高点91.50%,2005年基本没有显著变化,随后开启了下降趋势,2006年—2020年大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总体下降近7个百分点,2020年下降到最广义的实体经济占比84.51%,具体如图5所示。新冠疫情期间,随着房地产投资快速下滑,虽然金融业在持续发力,但虚拟经济占比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2021年和2022年广义实体经济占比从最低点又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

总体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21世纪我国实体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成功跃升为实体经济大国,特别是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更是奠定了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支撑,我国实体经济大国的地位已基本确立。2005年之后,尽管各层次实体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呈现出以金融支撑房地产发展的虚拟经济快速增长的新趋势。其中,实体经济核心层 R_0 在2011年出现“过快去工业化”趋势,从2011年的32.06%下降到2020年26.29%,10年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实体经济主体层 R_1 占比下降幅度

最大,从2000年到2020年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下降主要在2010年以后,10年间大幅下降10.28%,体现了“过快去工业化”趋势;2000年到2020年实体经济整体层 R_2 下降了约6.5个百分点,快速下降主要从2004年以后开始,虚拟经济占比从2004年8.5%上升到2020年的15.49%,上升了7个百分点。2021年和2022年我国三个口径实体经济占比开始逆转上升,这是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后国内和全球经济复苏、商品需求和实体经济投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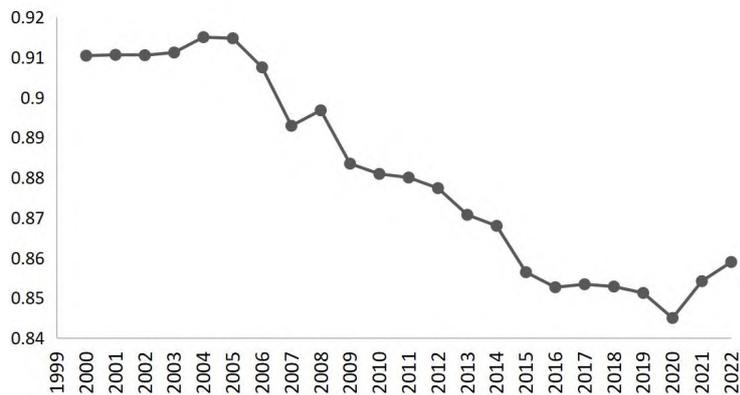


图5 2000—2022年实体经济 R_2 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

三、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全面理解中国各层次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正确判断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不仅需要上述对典型事实进行准确刻画,还需要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兼制造业大国进行比较。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是发达国家中最主要的四个工业大国,且中国与这四国制造业产出之和占全球一半以上,因此选取这四国作为比较对象具有代表意义。通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间两方面对实体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探究实体经济结构在发展进程中的演变规律。实体经济发展是以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为演进背景的,国际比较需要首先明确各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然后分析各个阶段和各个时点的发展情况。

(一)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五个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

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五个国家工业化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不同,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也不同。一方面,根据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中国在2000—2002年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2003—2010年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11—2020年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目前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人均GDP是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和衡量工业化进程最主要最准确的指标之一,根据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15]以人均GDP水平达到3377.5美元、6753.9美元和12658.4美元(按2011年不变价美元)为标准,将工业化水平划分为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并以此对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阶段进行划分,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按照人均GDP变化情况看,美国在19世纪末就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大体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到工业化中期,60年代进入到后期,70年代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还处于工业化初期,70年代处于中期,80年代处于后期,进入90年代步入后工业化阶段。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实体经济的典型事实和发展情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这长达70年的历史进程中,四国因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实体

经济展现出了各异的发展特征,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表 1 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工业化发展阶段比较

人均 GDP 标准 (美元)	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根据指数)	
	年份	人均 GDP	年份	人均 GDP	年份	人均 GDP	年份	人均 GDP	年份	人均 GDP
工业化初期 1689 ~ 3378							1966	2094	2000	2002
							1967	2232	2001	2153
							1968	2468	2002	2334
							1969	2764		
							1970	2975		
							1971	3222		
工业化中期 3378 ~ 6754					1953	3944	1972	3388	2003	2552
					1954	4116	1973	3822	2004	2794
					1955	4417	1974	4113	2005	3094
					1956	4699	1975	4362	2006	3468
					1957	4999	1976	4856	2007	3941
					1958	5243	1977	5368	2008	4299
					1959	5665	1978	5856	2009	4680
					1960	6354	1979	6266		
							1980	6064		
工业化后期 6754 ~ 12 658							1981	6399		
	1891	6811	1952	7257	1961	7055	1982	6821	2010	5153
	1892	7324	1953	7818	1962	7614	1983	7612	2011	5614
	1895	7160	1954	8364	1963	8176	1984	8304	2012	6015
	1900	8038	1955	9240	1964	9035	1985	8859	2013	6439
	1905	9121	1956	9846	1965	9459	1986	9756	2014	6874
	1910	9637	1957	10 348	1966	10 370	1987	10 865	2015	7315
	1915	9164	1958	10 739	1967	11 400	1988	12 040	2016	7771
	1920	10 153	1959	11 440	1968	12 725	1989	12 759	2017	8261
	1925	11 150	1960	12 282					2018	8778
	1930	10 695	1961	12 675					2019	9267
	1935	9681							2020	9452
	1939	11 171							2021	10 241
1940	12 005							2022	10 549	

注:表中数据为 2011 年不变价美元;1991 年之前德国数据为西德数据。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日本统计局、韩国国家统计局、德国联邦统计局、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previous-sector-database、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23)。图 6、图 7、图 8 同。

第一,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和德国的实体经济 R_0 占比呈现持续下滑基本态势,韩国呈现上升趋势,日本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后,各国实体经济 R_0 占比都基本稳定。

如图 6 所示,美国表现出缓慢持续大幅度下降特征,美国实体经济 R_0 占 GDP 的比重从 1955 年的

29.12%持续下降到2022年的11%，67年间下降了18.12个百分点。在2009年之后基本稳定在11%~12%这一个非常低的比重；德国表现出缓慢较大幅度下降特征，德国实体经济 R_0 占比从1970年的34.28%下降到2022年的20.39%，52年间下降了13.89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趋于稳定，维持在21%~23%；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实体经济占比呈缓慢上升态势，20世纪90年代之后呈现出缓慢小幅度下降特征， R_0 占比从1991年的25.54%下降到2021年的20.47%，30年间下降了5.06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趋于稳定，基本在19%~22%区间，也就是这5个百分点的下降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属于缓慢上升型，实体经济 R_0 占比实现了正增长，从1953年的2.94%逐步上升至2022年的26.69%，69年间上升了23个百分点，大体上在2010年后进入平稳，保持在26%~27%的水平。

具体各国制造业占比特点归纳如表2所示，总体看，进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占比都会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到后工业化阶段之后，都会稳定在一定比例上，美国是唯一一个 R_0 占比稳定在10%的国家，其他各国都稳定保持在20%以上，而韩国是唯一持续上升的国家，并稳定在25%以上的较高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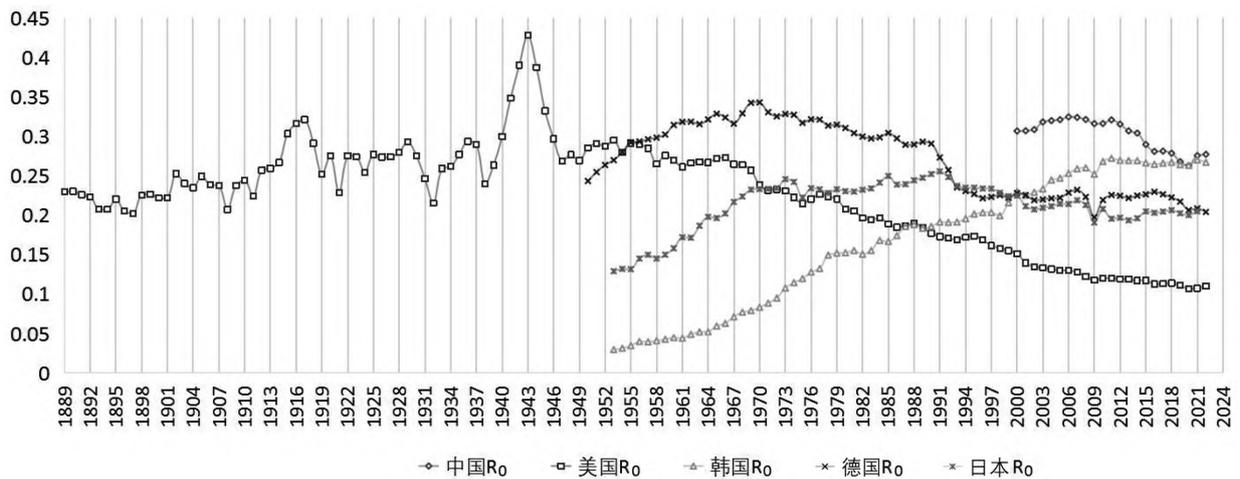


图6 中国、美国、韩国、德国、日本 R_0 占GDP比重对比

注：表中数据为2011年不变价美元；1991年之前德国数据为西德数据。

表2 发达工业国家实体经济 R_0 典型事实

国家	变化特征	具体变化
美国	缓慢较大幅度下降	1955—2022年在67年间下降18.12个百分点，到2009年后基本稳定在11%~12%
德国	缓慢较大幅度下降	1970—2022年在52年间下降了13.89个百分点，到2000年后基本稳定21%~23%
日本	缓慢小幅度下降	1991—2021年30年间下降了5.06个百分点，到2000年基本稳定19%~22%
韩国	缓慢较大幅度上升	1953—2022年69年间上升了23.75个百分点，到2010年后基本稳定26%~27%

第二，典型发达国家实体经济 R_1 占比主要呈现先波动上升、后持续下滑的基本态势，并在2010年后基本保持平稳，这一过程的拐点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去工业化发生时间基本同步，^①美国因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总体实体经济 R_1 占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如图7所示，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完成工业化，其 R_1 占比从1951年的43.07%下降到2022年的19.69%，大幅下降了23.38%。韩国从1953年到1978年， R_1 占比在40%~42%波动变化，之后从1978年的41.27%波动下降到2022年的35.35%，比峰值小幅下降5.92%。德国从1950年的44.81%波动上升至1970年的49.15%再逐渐下降到2022年的30.68%，比峰值下降18.47%。日本从1953年的41.02%波动上升至1973年的48.03%再逐渐下降到2021年的39.47%，比峰值下降7.47%。2010年后，美国、德

^① 二战之后，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进程，韩国虽然没有明显的去工业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进入后工业化。

国、日本、韩国的 R_1 占比基本稳定,分别保持在 19%~22%、30%~32%、38%~40% 和 35%~37% 的水平。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 R_1 占比到后工业化阶段,大致都呈现基本保持平稳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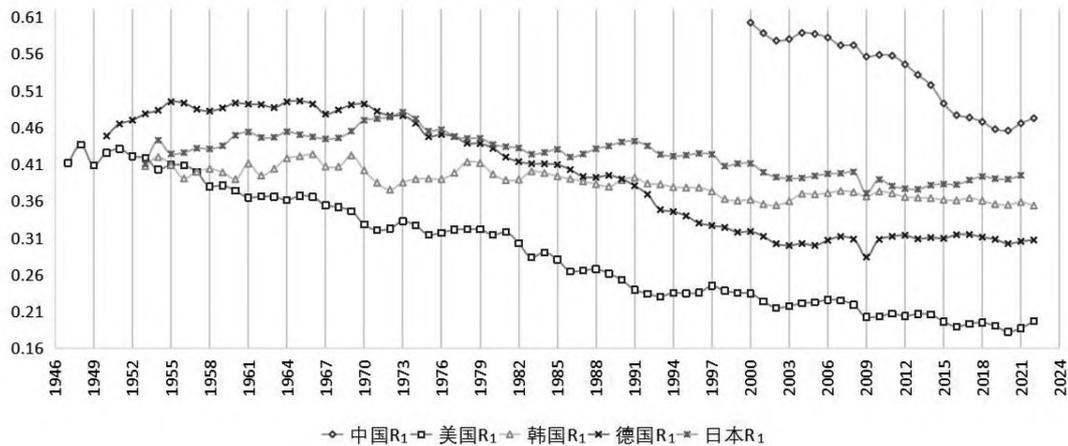


图7 中国、美国、韩国、德国、日本 R_1 占 GDP 比重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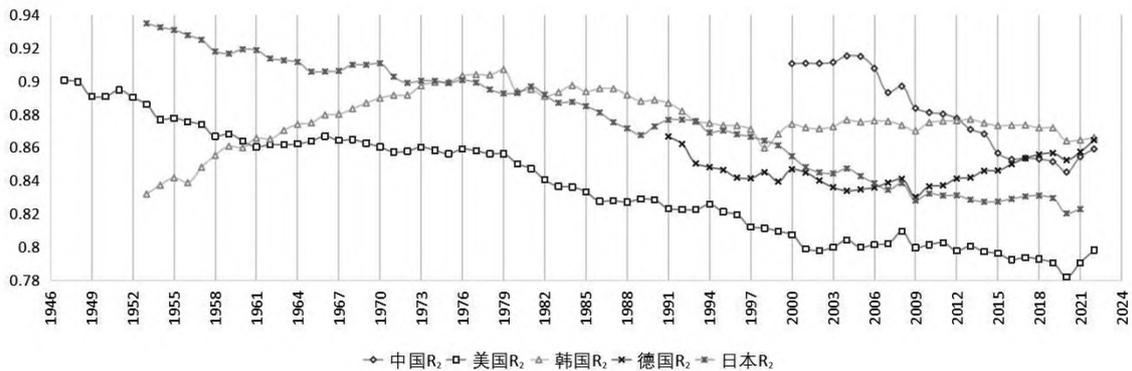


图8 中国、美国、韩国、德国、日本 R_2 占 GDP 比重对比

第三,发达工业国家实体经济 R_2 占比呈现显著的分化现象,美国、日本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韩国和德国呈现波动变化趋势。

如图8所示, R_2 比重变化情况取决于该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情况,可以将 R_2 比重变化趋势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美国和日本是显著下降型,其中美国从1951年的 89.46% 下降到2022年的 79.81%,下降了 9.64%;日本从1953年的 93.46% 下降到2021年的 82.27%,下降了 11.19%。二是韩国是先上升后下降波动型,从1953年的 83.18% 上升到1979年的 90.69% 再波动下降到2022年的 86.60%。三是德国是先下降后上升波动型,从1991年的 86.65% 下降到2009年的 83.00% 再上升至2022年的 86.43%。波动型的总体变化幅度相对较为平稳。

(三)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实体经济特征比较

从与中国可比性角度出发,分别对比工业化中期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三层实体经济特征,以及工业化后期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三层实体经济特征。

1. 工业化中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德国也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与中国数据可比性差,因此仅比较日本、韩国情况。日本和韩国在实体经济 R_0 和 R_1 层次的特征非常相近, R_0 占比都持续小幅上升并达到 15%, R_1 占比分别稳定在 41%~44% 和 38%~41%。而在工业化中期,中国 R_0 占比保持在 31%~32% 的水平,是日韩的两倍, R_1 占比基本保持在 57%~59%,也高出接近 20 个百分点。从 R_2 层次看,在工业化中期,日本开始呈下降趋势,从 93.4% 逐渐下降到 91.9%,韩国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在89%~91%之间波动,中国整体呈下降趋势,达到88.35%,比峰值下降了3.15个百分点。中国在实体经济 R_0 和 R_1 层次比日本和韩国有更稳固的基础,但在 R_2 层次占比略低于日本和韩国,且下降幅度较大、速度更快,相对而言虚拟经济占比较高,增速较快。 R_2 层次实体经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变化情况具体如图9所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预示着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业开始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增速在这一时期较为显著地依赖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拉动,“脱实向虚”问题在工业化中期已初露端倪。

2. 工业化后期。在实体经济 R_0 层次,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在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占比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美国在波动中从22.58%上升到29.98%,德国从26.35%上升到31.82%,日本从17.18%上升到22.35%,韩国从15.03%上升到18.32%(韩国一直是上升趋势),而中国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达到27.7%,比峰值下降了4.37个百分点。美国、德国、日本大体是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后才出现制造业显著下降趋势。虽然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有一定特殊的历史背景,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是,从 R_0 占比来看,与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在工业化后期一定程度出现了制造业占比过早下降的问题,也就是过早去制造业现象。

在实体经济 R_1 层次,德国、日本分别在48%~50%和44%~46%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韩国呈下降趋势达到37.93%,比峰值下降2.06%;中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55.82%大幅下降到45.54%,之后小幅上升到47.22%。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 R_1 层次对比发现,中国出现了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现象。

在实体经济 R_2 层次,日本韩国分别在90%~92%和89%~90%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略微出现下降趋势,德国和中国呈现下降趋势,德国从86.95%下降到85.6%,下降了1.35个百分点,中国从88.1%下降到85.9%,下降了2.2个百分点。从占比和趋势两方面都能发现,中国实体经济占比偏低,下降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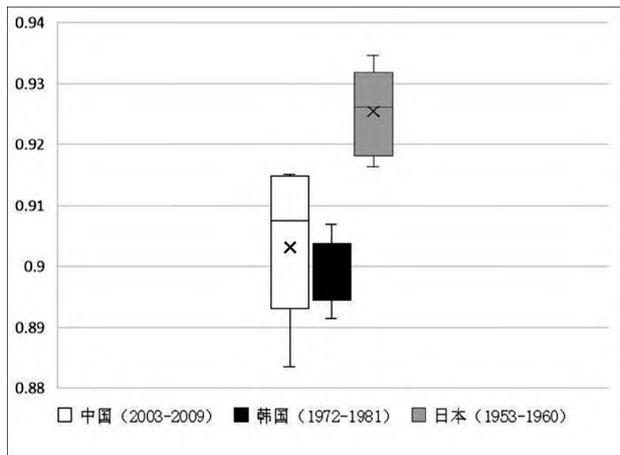


图9 中国、韩国、日本工业化中期实体经济 R_2 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3)、世界银行数据库、日本统计局、韩国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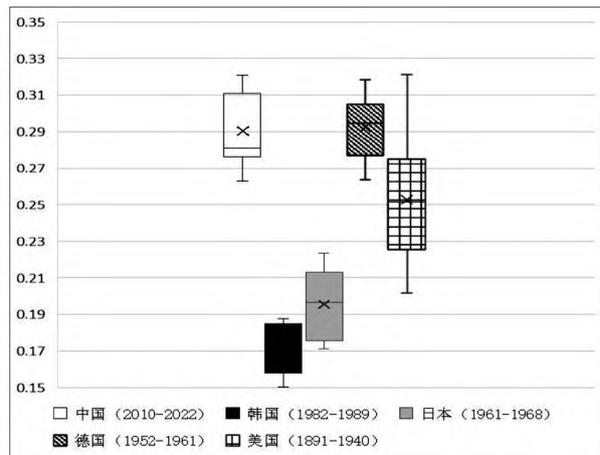


图10 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美国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 R_0 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3)、世界银行数据库、韩国国家统计局、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previous-sector-database。

(四)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特征

2000年之后中国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加入WTO开启了快速工业化,并很快从工业化中期阶段推进到工业化后期阶段,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后期的跨越,到2020年

之后,基本实现工业化,开始了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对比美国、德国、日本、韩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实体经济三个层次的变化特征,以及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判断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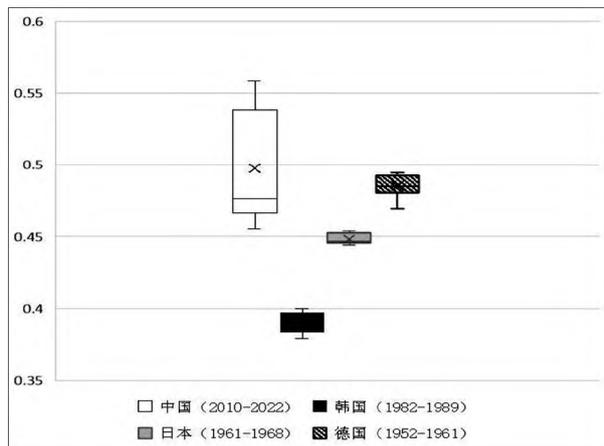


图 11 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 R₁ 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3)、世界银行数据库、韩国国家统计局、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previous-sector-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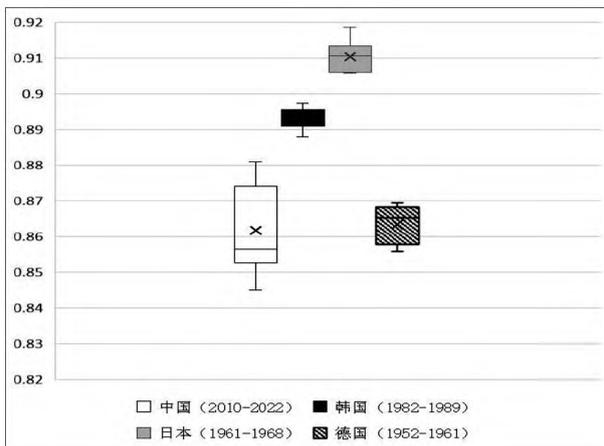


图 12 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 R₂ 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3)、世界银行数据库、韩国国家统计局、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previous-sector-database。

一方面,实体经济 R₀ 占比在工业化后期开始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从整体变化趋势看,中国属于快速小幅下降型,实体经济 R₀ 占比从 2011 年的 32.06% 下降到 2022 年的 27.7%, 11 年间下降了 4.36%, 下降速度远快于美国、德国和日本,总体而言,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早过快去制造业化”问题;从实体经济 R₁ 层次看,也同样呈现占比过早过快波动下降趋势,属于快速、大幅下降,存在一定程度的“过早过快去工业化”问题;从实体经济 R₂ 层次看,由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更依赖房地产拉动,“脱实向虚”问题在工业化中期初步显现,而且整个工业化中后期下降速度相对较快,呈现快速小幅下降的特征,也存在过早过快“脱实向虚”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实体经济 R₀ 占比从 2016 年开始进入平稳,保持在 27% ~ 28% 的水平,略高于韩国,高于日本和德国,远高于美国水平,当前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最大的国家;中国实体经济 R₁ 占比始终高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一直保持着体量大、门类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实体经济 R₂ 占比与德国和韩国相近,但高于美国和日本。这总体上意味着,由于新时代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求保持制造业比例稳定,并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推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无论是“过早过快去制造业化”问题,还是“过早过快去工业化”问题,以及“脱实向虚”问题,都基本得到遏制,中国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总体上步入高质量发展之路。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过早过快去制造业化”“过早过快去工业化”“脱实向虚”问题得到遏制,我国现有各个层次实体经济占比保持了基本稳定,但随着新型工业化进程深化拓展,保持各个层次实体经济占 GDP 比重在某一合理水平的基本稳定状态,对于我国这个 14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稳定可持续发展而言,尤其是对于形成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具有先进性、完整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至关重要。另外,还需要认识到,我国制造业占比高还可能存在由于统计口径^①不同导致的高估问

① 标准产业分类法系统 SIC 和北美产业分类系统 NAICS。

题。英美的统计方式将与制造业相关的技术服务,以及制造过程中集成的非实物投入等显著增加产品经济价值、依附于制造系统而存在的活动均被统计为服务业。而中国制造业的产值统计将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服务业统计归类为制造业。因此,存在英美国家制造业产值低估、服务业产值高估和我国制造业产值高估、服务业产值低估的问题,导致中国制造业和工业增加值相对发达国家的虚高。^[26]

四、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5]。这意味着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推进高质量发展。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强而不大,供给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看,我国实体经济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 R_0 与 R_1 的内部结构失衡问题:有效需求不足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是产业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问题的一体两面。我国 R_0 和 R_1 层次的产业高级化程度不足导致总体上产能很大,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但一部分传统产业的中低端供给是无效供给,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而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结合不够,高质量、高水平的高端智能制造行业等有效供给不足。这一问题直接外在表现为产品价格低迷、CPI持续负增长的同时,制造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产能利用率严重低于平均水平,部分新兴行业由于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产能过剩严重。

(二) R_2 的外部结构失衡问题:虚拟经济在长期脱离实体经济扩张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系统性风险

R_2 的外部结构问题主要是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虚拟经济在长期快速扩张之下所积累的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十一五”至“十三五”时期,房地产业一直在持续增加杠杆,各时期沪深上市房企的权益乘数分别为3.5、3.6、4.0,2021年为4.1。“三道红线”调控以来,虽然房企的负债水平有所下降,但平均负债率仍接近70%,虚拟经济中银行业、非银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业是负债水平前三高的行业。虚拟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仍然巨大,有效化解需要统筹协调和时间过程。

(三)实体经济“卡脖子”问题:一些关键短板依然存在

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一些制造业行业仍然存在较多“核心能力短板”“关键能力短板”和“基础能力短板”,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仍没有突破。根据中国工程院2019年的报告,从先进性角度,26类代表性制造业中我国有5类技术领先、6类技术先进,但仍有飞机、航空机载设备及系统、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机器人、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节能汽车、高性能医疗器械、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等10类与先进水平差距大,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空发动机、农业装备5类技术差距巨大。从安全性角度,60%的产业总体安全,其中6类产业自主可控,占比23%;10类产业安全可控,占比38.5%;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占比0.77%,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30.8%。其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热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行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等产品处于被“卡脖子”的状态。在制造强国建设推动下,通过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现在上述先进性和安全性问题总体得到改善,但是在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工业母机、航空发动机、新材料、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及工业软件等方面“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

五、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建议

对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着力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

创新实现核心突破,解决实体经济存在的“卡脖子”问题,推动实体经济在各个层次优化结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发展、协同发展、完整发展、安全发展等四方面着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

(一)以科技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技术先进性

保持实体经济技术先进性需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通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完善反垄断等竞争政策,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培育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环境,从制度和体制层面解决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现代制造业是创新的引擎,也是创新最为密集、最具引领和放大作用的领域,要围绕“工业四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强化构筑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建立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质”的层次提高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创新引领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是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这要求健全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产业经济数字化;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同时,注重通过数字经济产业化和产业经济数字化,逐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二)以战略协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协调性

在三次产业日趋融合的大趋势下,要更加重视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的协同发展,包括各类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各类企业高度协同、各产业之间有效配合、产业链条各环节有序承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有效服务、区域之间合理布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对于实体经济,需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发展,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提高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升级。尤其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化解房地产风险。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形成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

(三)以量促质保持实体经济体系完整性

中国目前是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规模最大的国家,所拥有的由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的工业体系,已经涵盖了联合国工业分类目录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能够继续保持我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基本规模和“量”的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为创新的知识来源、作用对象和“质”的提升提供坚实基础。尤其要注意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以有效投资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补短板”扩大实体经济规模,还是“促升级”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都需要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加快建成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建设、水利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其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通信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融合基础设施,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建设,这对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以强链补链增强实体经济产业安全性

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在实体经济层面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效推进产业链的强链补链稳链,积极开展重点领域产业竞争力调查和产业安全评估,完善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尤其是建立权责清晰、多部门紧密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针对能

力缺失型、能力破坏型和能力响应型三种产业安全问题,分别进行培育、防御和重构。针对能力缺失型产业安全,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针对能力破坏型产业安全,要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针对能力响应型产业安全,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

参考文献:

-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8-08-01].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test/2008-08/01/content_1061490_4.htm.
-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1-12-15.
-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2-11-17].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18cpe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sid_for_share=80113_2.
- [7]李晓西,杨琳.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J].财贸经济,2000(6):5-11.
- [8]刘金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性的计量检验[J].中国社会科学,2004(4):80-90.
- [9]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经常性背离关系的论证[J].上海经济研究,2003(12):18-25.
- [10]曹源芳.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关系——基于1998—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57-62.
- [11]王爱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3(1):8-11.
- [12]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2003(2):34-40.
- [13]刘骏民,王国忠,王群勇.心理支撑与成本支撑价格系统的实证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价格波动性的比较[J].经济动态,2004(9):14-18.
- [14]黄群慧.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7(9):5-24.
- [15]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4-15.
- [16]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2012-08-16].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zdt/2012-08/16/content_2204856.htm.
- [17]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2022-09-14].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2-09/14/content_5709704.htm.
- [18]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EB/OL].[2023-12-12].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636.htm.
- [19]工业实力持续增强 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EB/OL].[2022-09-15].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2-09/15/content_5709963.htm.
- [20]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EB/OL].[2012-09-04].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zdt/2012-09/04/content_2216428.htm.
- [21]农业发展成就显著 乡村美丽宜居——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EB/OL].[2022-09-15].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2-09/15/content_5709899.htm.
- [22]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七[EB/OL].[2012-08-24].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zdt/2012-08/24/content_2210201.htm.
- [23]简·欧文·詹森.服务经济学[M].罗先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4]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EB/OL].[2012-08-16].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zdt/2012-08/16/content_2205006.htm.

[25]服务业地位作用更加彰显 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EB/OL].[2024-09-11].中国政府网, https://www.stats.gov.cn/sj/sjld/202409/t20240911_1956378.html.

[26]黄群慧,杨虎涛.中国制造业比重“内外差”现象及其“去工业化”涵义[J].中国工业经济,2022(3):20-37.

(责任编辑:金光敏)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hina's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New Industrialization

HUANG Qunhui, HAO Xinh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The real econom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core layer (R0,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in layer (R1,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and the overall layer (R2,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ther than finance and real estate). Based on the three-layer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the real econom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re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compares China's real economy with those of four typical industrial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and since the 1950s. Overall,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conomy has three problems: too early and too fast deindustrialization, too early and too fast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shifting from reality to virtual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China has highlighted the real econom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ing a stable propor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formulating a bundle of economic polici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these efforts, the trends mentioned above have been basically curbed, and China's real economy at the three layers has generally embrac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accelerate new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e should incorporate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strategic coordination,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quality leap which is promoted by quantity accumulation, and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the real economy by strengthening the chain.

Keywords: Real Economy; New Industrialization; Propor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